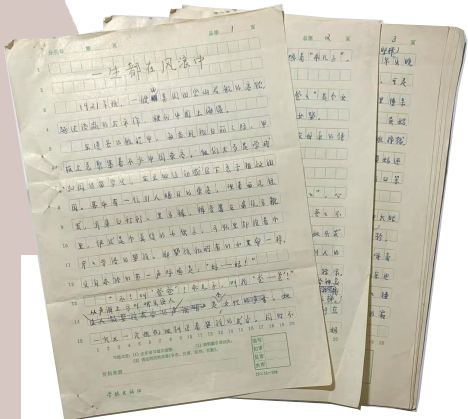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岁老作家欧阳文彬(1920—2022)生前多次对我说起,想撰述传记,书名也想好了,叫《一生都在风浪中》。虽然最终未能告竣,但欧阳跟我谈起十四年抗战的艰苦岁月,依然在我脑际萦绕。



■ 欧阳文彬传记手稿

流亡学生的日子

欧阳文彬曾跟我说,她祖籍湖南,出生在美国,一岁由父母从美国带回,以后一直跟随在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(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),在南京上的幼稚园,那是母亲留美闺蜜陈鹤琴创办的。1937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毕业,并顺利考取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。可此时,抗战烽火已遍地燃起。南京、苏州等地民众纷纷逃离,踏上离乡背井之路。她只得随母亲流亡到内地长沙。而东吴大学也要撤迁到江苏高淳,这样,十七岁的欧阳虽然考取此校却无法前往就读。

到了长沙,那里的湖南大学等高校都已停止了招生工作。无奈之下,母亲想办法让她插班进入民办群治农商学院经济系。可是长沙也不太平,日机天天轰炸,警报拉响,人心惶惶,赶紧躲进防空洞,待敌机飞离,人们出来一看,好好的房屋已经被炸毁,来不及逃跑的人,死的死伤的伤,横在街头,惨不忍睹。两个月不到,群治学院也被炸平,只得停课。一个月后,听说北平的民国学院迁到长沙,虽然已是学期中间了,仍可就地招生,这给了欧阳一丝上学的希望。她与一批同样流亡到长沙的学子,进入该校就读。虽然不是名校,老师却是一流的,历史学家吕振羽、翦伯赞,文学理论家谭丕模等,作家张天翼教“文艺写作”。爱好文学的欧阳,虽然读法律专业,却选修了这门课,她想学习写作诀窍,可张天翼一进教室讲课,就说“文学写作是没有诀窍的,只有多读多写,不要相信‘小说作法’之类书”,当场布置习作并一一讲评。欧阳的作文不差,多次受到张天翼的辅导,两篇小说习作被推荐给长沙《观察日报》副刊编辑黎澍,刊登后对欧阳鼓励甚大。

在民国学院,还有一位教世界语的地下党老师陈新,他在讲课中要求学生热爱国家,关心抗日救亡活动。他引导欧阳不断接受革命道理,最终介绍欧阳在1938年6月加入了地下党组织。在民国学院读了两个学期后,欧阳因缴不起学费,更因病无法随学校迁往湘西,在进退两难之际,张天翼知道了,对她说国难当头,课堂不是唯一选择,有志青年应该到抗日熔炉中锻炼自己。在长沙街头,欧阳第一次听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演讲,更坚定了她的决心。她决定辍学,投入抗日救亡工作。

张天翼、陈新、徐特立无疑是欧阳走上文学和革命道路的引路人。

加入抗日宣传队

在党的指示下,欧阳参加长沙文化界抗战后援会,与文艺工作者们一起,去医院慰问从前线抬下来的伤病员。看到他们年

欧阳文彬：投身抗战洪流

◆ 韦 决



■ 欧阳文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工作照



■ 青年欧阳文彬



■ 晚年欧阳文彬



■ 欧阳文彬与韦决

轻的身影卧在病床,欧阳有说不出的难过。见一位头缠纱布的战士,只露出鼻和嘴,她轻轻走过去,一口一口喂他进食,心中充满崇敬之情,也激起对日本鬼子的更大仇恨。不久,她进入“一致剧社”,都是有共同遭遇的流亡青年,更有共同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决心,大家走街下乡,在民众集中的地方,刷标语、画漫画、唱救亡歌曲、演活报剧等。有一次,在街头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演到卖艺老汉鞭打自己女儿时,竟有观众自动冲出来抢夺老汉的鞭子。欧阳和大家的演出取得如此效果,说明真正打动了群众,现场的激昂情绪也激励剧社演员,要更好地演好抗日救亡的戏剧。

这年冬天,国民党在长沙推行“焦土政策”,敌寇还未到,就自己动手一把火烧毁了这座古城,无数百姓葬身火海。欧阳与母亲幸好躲过灾难,劫

后余生,她找到党组织,提出要上前线杀敌的强烈愿望。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,欧阳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大队流动宣传队。这个队由二十多人组成,主要任务就是到长沙及湖南各地乡村宣传抗日。大家都是徒步行走,每到一村,就用演讲、歌唱等形式,传播抗战道理。因为流动性很大,大家只能轻装上阵,日日行军数十里,汗水湿透衣服,灼热的阳光加上体温,把衣服晒干晒干,女同志多有不便,只能硬扛,咬牙坚持。欧阳心想,环境再艰苦,前程是充满希望的。

由于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,形势较为严峻,按上级指示,欧阳和九战区流动宣传队中的几个党员,陆续找理由离队,自找工作,再接组织关系。欧阳也托病回家,住到零陵老家,焦急地等待机会。一天,欧阳在《救亡日报》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,令她兴奋不已,内容是桂林的新知书店招聘店员和练习生。当时桂林是抗战气氛最好的大后方,集中了许多进步力量,使欧阳向往之。于是,她决定前去应聘,背个小布包就上路了。没钱买车票,凭着九战区发的一身军装和一纸准假证,就免费搭车进了桂林。她也不知道,此行是凶是吉,路在何方。

在书店传播抗战真理

一下火车,欧阳直奔桂西路上的新知书店,接待她的正是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先生。徐雪寒问了她一些情况,就说考试还没开始,在店里先住下吧。欧阳一听,觉得有盼头了,晚上待门市部关门后,放书的长桌就成了她的栖身处。白天,她与店员一起,帮着搬运图书,整理上架,把书店当家里,店员们也把她当自家人一样。到考试这天,徐雪寒交给她两个任务,一是拟一份考题,经徐看过后就通过了,另一个任务是接待考生。考生们以为欧阳是老员工,其实她是没经考试就被录取了。从此,欧阳的一生,就与书刊打交道,没有离开过新闻出版界。

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,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,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店加大了迫害。继生活书店被勒令“限期停业”后,新知书店也面临关店的危险。为了减少损失,在反动派下手查封之前,先把书店盘给广西进步人士开办的文化供应社,一夜之间换了店招,店员还是新知原班人马,第二天开业,欧阳与店员们都是熟门熟路,有条不紊。由于文化供应社创办人与国民政府的一些文职人员较熟悉,体现出进步力量对新知书店的支持,同时也保存了抗日的有生力量。

两年后,由于欧阳工作出色,党组织把她调往重庆,新知书店总店负责人沈静芷向她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

示,要书店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区域开办一家书店,方便政府工作人员就近购买进步书刊,以此来凝聚更多抗战力量。新知书店决定在上清寺开设分店,又不能让人觉察到这是一家与新知相关的进步书店,就取名亚美图书社,人员都从外面调入。这样,欧阳悄悄地到曾家岩五十号中共八路军办事处(对外称“周公馆”)接上组织关系。作为店里唯一的党员,欧阳从负责财务会计,到担任经理。在经营方针上,亚美图书社采取较灰色的策略,即政治色彩不外露,如我党刊物《群众》,藏在柜台下面,只售给熟悉的读者。进步作家及革命理论书籍,夹在知识类书籍中,只露出书脊,供读者自选。如此,不但吸引了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,重庆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也来了不少。亚美不但销售图书,还成了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的联络点。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保释出来后,就在亚美与文友们会面。由此欧阳结识了作家胡风、吕荧、中央通讯社编审兼文风书店总编辑韩待彬等,得到他们不少帮助,搞活了店内经营。

可是,好景不长。有人支持亚美,也有人来捣乱。国民党机关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。先是地区保甲长以“维持治安”为名,要店里派人去街上义务站岗、巡夜,店里人手紧张,只得付些钱,让勤杂工去应付了事。接着又要抽壮丁,白天闯进几个警察,抓走店员老周,欧阳赶紧追到派出所,眼看老周将与一批壮丁被拉走,就急中生智报告了新知总店领导,终于通过关系,花了一笔钱把老周救出。还有就是三天两头来查账,因亚美的开办经费全是新知拨付的,一旦查起来就麻烦了。只得通过税务局的朋友,请税务稽查官吃饭,酒后吐真言,这稽查官又诉苦又发牢骚,查账之事自然不了了之。更难以对付的是,当局常常暗地里派特务进店查书,表面上说查违禁书,实际就是找碴儿闹事,不让书店经营下去。

终于有一天,一个特务头子模样的人进店,扬言要找经理,并勒令书店立即停业。他们先把欧阳软禁起来,在找不到保人之前不得自由行动,其余店员解散自谋出路。冯雪峰闻后,赶紧找好友韩待彬来担保,终于使欧阳脱险。后经党组织研究,决定撤销亚美这个据点。为了不暴露身份,欧阳想另找一份工作暂安身。可前途茫茫,她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正在这时,开明书店的傅彬然闻听后,找到欧阳,说与叶圣陶商量决定,请她进开明书店工作。这样,欧阳进了《中学生》编辑部,从读者、作者,最终成为《中学生》的编辑。

战时的《中学生》,已把重点从文化辅导转到团结抗日、民主进步的宣传上。在抗战消息被封锁的情况下,《中学生》发表宋云彬的《抗战四周年回顾》等文章,向青年读者透露了许多事件的真相。《中学生》就是这样,帮助青年认清形势,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,并以《中学生》杂志名义,代表开明书店参加各种抗战宣传活动。在编辑岗位上的欧阳,思想上得到极大的提高。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,欧阳与开明书店同人一起,从四川回到上海,在虹口迎接上海解放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欧阳文彬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公私合营后的《新民报》晚刊(《新民晚报》前身),担任报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(当初还没有党委建制)、副总编辑。进入晚年,欧阳请我协助她编辑五卷本《欧阳文彬文集》,常有机会听她聊天。一天,她拿着一张旧照片说,这是我抗战时期所摄,给你留个纪念。这张珍贵的肖像照,更是她抗战经历的一个缩影。